

山田慶兒著《古代東亞哲學與科技文化》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

李建民*

本文共分四個部分：一是介紹山田慶兒(Keiji Yamada)先生致力中國科學、技術及醫學歷史研究的學術背景；二是對《古代東亞哲學與科技文化》(以下簡稱《東亞哲科》)一書各篇內容作扼要的介紹；三是談山田慶兒的研究對台灣學界的若干啓示；最後，是筆者所輯的〈山田慶兒先生論著目錄〉(1961-1996)，共51種。

日本的中國科學史研究，從十九世紀末葉算起，至今約有近百年之歷史了。川原秀城曾將上述的歷程分爲：(1)、開拓期(約1900-1930)；(2)、充實期(約1930-1970)；(3)、現在(約1970-)三期。其中，在1930年和1970年前後，曾經經歷了兩次重大的研究方法及觀點的轉變¹。山田慶兒上承戴內清的京都學統，淪啓中國科學的思想史、社會史研究系譜，成爲「充實期」到「現在」這一階段關鍵性之人物。而在此之前，日本的中國科學史主要偏重學科史的研究，即著力於科學概念以及學說的分析和解說。川原秀城說：

.....在「開拓期」和「充實期」其所以未能對思想史和社會史進行徹底的研究，主要是因為還缺乏可以信賴的學科史研究；當進行通盤思考之際，還沒有一幅使人用之有效的統觀全局的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¹ 川原秀城，〈日本學者如何研究中國科學史〉(上)、(下)，《自然科學史研究》12：3、4(1993)。

鳥瞰圖。但當「充實期」完了之際，學科史的研究已進行得較為徹底，經過如此的多方積累，對中國科學史進行綜合研究的情況才為之一變。進行思想史、社會史研究的條件成熟了。科學史研究的新時代於是誕生。而體現這種這時代精神的科學史家，正就是山田慶兒²。

值得一提的是，藪內清在確立自己的研究風格時，受到京都大學天體物理研究所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學風所影響。山田慶兒的學術背景相彷彿，他是京大宇宙物理學科卒業(1955)，同大學院文學研究科西洋史修了(1959)。不過，相對藪內清「李約瑟難題」³的治史意識，山田慶兒的問題意識最初來源於「與西歐近代誕生之科學不同的另一種科學是否成立」及「難道不能有另一種科學嗎？」(〈自序〉)於是，研究與西歐社會完全異質的思想性風土孕育的中國科學，便成為他探索與解答上述問題的內在性動機。而其思想史、社會史的取向豐富了前人已構築的中國科學「鳥瞰圖」。

根據山田慶兒的自述，其從事中國科學史研究三十載，始終圍繞以下幾個中心性的主題：

一是傳統性的自然哲學與科學思想中所展現的思考方法，或稱之為概念與思想的框架。二是科學、技術之發展與國家、社會中占居一定位置，發揮著不可缺少的作用，而獲得的特性。三是原本不同的兩種人類活動，即作為認識行為之科學與作為製造行為之技術，各自的特性與兩者的關係，以及存在於人類活動總體之中的科學、技術的位置(〈自序〉)。

² 川原秀城，〈日本學者如何研究中國科學史〉(下)，頁306。

³ H. Floris Cohe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 Historiographical Inqui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 418-488。

《古代東亞哲學與科技文化》一書即展現了山田慶兒對上述問題的構思與回答。以下，便依次摘述書中各篇之大旨。

第一篇〈傳統性自然哲學的思考方法〉。山田慶兒以爲：「陰陽說與五行說被統一於氣的理論，成爲中國哲學的基本語言」，「而且陰陽五行的思考在秦漢以後一直是中國自然哲學上的思考的基礎形態。不管陰陽五行說是否以其樸素的形態被納入這種理論當中，但如去掉陰陽五行說的思考，是不會有中國的傳統科學的」（《東亞哲科》，頁9、頁64）。他認爲陰陽說與五行說所體現的二分法與三分法原理，最初源於對「空間」分割的兩種原理。當然，空間的分割是對應著時間的分割。

而空間分割的這兩種構造，在儒家經典《易》與道家經典《老子》中被垂範爲宇宙生成論的圖式。前者爲「二極構造」，後者稱爲「三極構造」。兩者的差別在於是由「上下」抑或「內外」的觀念來把握世界。關於這二種思維方式，山田慶兒在分析九宮、八風與《五十二病方》的咒術（《東亞哲科》，頁203-205、頁281-282）都有進一步的說明。事實上，傳統中國蓋天說與渾天說的宇宙模型也可以用上述的思考方式來理解（《東亞哲科》，頁30-31）。相較於涂爾幹（Emile Durkheim）等把邏輯性的分類起源求之於社會組織，即求之於經驗性的東西，山田慶兒卻預想有一種「先驗性」的東西存在；再者，涂爾幹（Durkheim）等把一切都還原于二極構造的思考空間，山田慶兒則製定了三極構造的思考空間（《東亞哲科》，頁39）。本書的第二篇〈空間・分類・範疇——科學思考的原始基礎性形態〉對以上的課題有更深入的探討。

第三篇〈模式・認識・製造——中國科學的思想風土〉。產生中國式的民族科學（ethno-science）的思想風土爲何？山田慶兒分（1）、語言與思考；（2）、眼睛和形態；（3）、存在與作用；（4）、方法與技術等嘗試

捕捉中國對對象世界認識的方式。例如，他以爲中國語言的特色，與造句空間比較則意義空間往往更爲優越；在所謂的語言場的構造裡，最底層的行動空間，對象世界經常是對行動中事物而言有意義的存在。中國的「感應」理論、「體用」邏輯(《東亞哲科》，頁85-88)亦即是這一套思想的展現。換言之，對中國人而言，對象世界即在意義相關之中，而事物乃個別性、具體性和意義性三者具備的存在。山田慶兒以「畫論」考察了「形成目的特有的形變空間」，這種形變亦是在和行動相關情況下的一種意義存在化的空間(《東亞哲科》，頁101)。

又，山田慶兒提出了中國的自然語言／人工語言(模式符號化的語言)之間的落差。而中國人解決的取向是：「認識的切斷以及由人工語言(量符號)而產生的『對象的符號化』」(《東亞哲科》，頁115)。

上文可謂勝義紛披，山田慶兒引證博洽，真做到了「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程度，故很難作簡單的摘述。其中不少舉證恐怕與山田慶兒熟諳朱子自然學的體系有關。

第四篇〈《物類相感志》的產生及其思考方法〉。《物類相感志》是北宋贊寧(919-1001)所撰。所謂「相感」，是指兩種事物或現象之間一方對另一方的作用。此處的「相」並無 *mutual* 的意思，而意指著「感應」一詞。有趣的是，《物類相感志》的記述方式，排斥了陰陽之氣的理論而只從事現象的記載與分類。何以如此？從天人相感到物類相感之間、在實踐家之路與認識者之路的歧異徘徊、於技術與科學對話中擺盪，山田慶兒指出：「《物類相感志》用典型的方式顯示了中國人思考方法的一個重要側面，所以這本書必須引起關注。中國人的思考方法是極其經驗的、實踐的、技術性的」(《東亞哲科》，頁137-138)。讀者可仔細品味山田慶兒的論析。

第五篇〈技術的意義〉是值得吟嘆再三的大作。山田慶兒陳述「工具—製造工具的工具」的二重性與「自然語言—人工語言」的二重性

的特質；也點出了若今天人類生存確是面臨危機、人與技術之間也有難以協調的境遇的話，「人類的另一個根本性行為——語言」該展現、扮演何種角色。

第六篇〈梁武帝的蓋天說與世界庭園〉。作為最後的蓋天說的信奉者，武帝所信奉的是蓋天化的須彌山說。然須彌山說與蓋天說本質上是不同的兩種世界觀，兩者是如何接嫁成為新說呢？魏晉以後，蓋天說的支持者已近於絕跡，事實上梁武帝所復興的新蓋天說也是曇花一現。那麼，他推崇蓋天說的熱情的源泉到底是什麼呢？

山田慶兒指出中國科學有令人驚奇的持續性的特質，而支撐此一持續性的是作為一種制度的科學。它超越了王朝的盛衰與官僚制度一道頑強地生存著。這種制度性的科學告訴我們，梁代被人們所公認作為蓋天說的復歸，沒有武帝那樣的權力者的意志是不會產生的。其次，也告訴我們何以這一復歸對後世毫無影響的理由。更進一步，也告訴我們佛教思想（須彌山說）如何通過傳統的「過濾器」而脫胎換骨，從遠處包圍了傳統世界的價值觀，而武帝的行動也充分體現了構成這一過濾器的傳統思考和價值觀念的強固。

值得一提的是，關於科學與國家的課題，山田慶兒曾以元代的授時曆為中心，生動的構築了官僚制度下的科學和科學集團的活動（見《授時曆之道——中國中世的科學與國家——》一書的討論）。《東亞哲科》的最後一篇〈近代科學的形成與東漸〉也涉及到此一課題（頁338-349）。

第七篇到第十三篇集中在醫學史的課題。除了〈夢的地平〉及〈名醫的歸宿〉（華佗研究）之外，其餘各篇都圍繞在「中國醫學的形成問題」之上。

川原秀城曾說明中國技術書籍的編寫特色：

中國古代醫書，大都是直接引用前代的文獻，把過去的成果吸收進來，再添加進新的知識，即是用所謂滾雪球方式編纂而成

的。因此在古代醫書中，引用前代的引文部分，占很大比率。這種方式確實有可能把前代的知識流傳給下一代，但是反過來說，它也孕含著重大的缺欠。可以使醫學理論傳承以及相互關係曖昧不清，就是其中重大的缺欠。結果使唐代以前的醫學書籍的成書年代、傳承過程等等都模糊不清，不能斷定書中的那一部分是反映哪一時代的醫療技術，這類事情是很多的，而對中國醫學的形成有直接關係的三國時代以前的古醫書說來，就更不清楚了⁴。

而促使山田慶兒建立中國醫學成立史新說，是來自馬王堆醫書的發現。〈夜鳴之鳥——咒術的結構與思考方法〉便是其中一篇。

馬王堆醫書共十四種：《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脈法》、《陰陽脈死候》、《五十二病方》、《卻穀食氣》、《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導引圖》、《養生方》、《雜療方》、《胎產書》、《十問》、《合陰陽》、《雜禁方》、《天下至道談》。〈夜鳴之鳥〉一文旨在通過分析《五十二病方》中嬰兒瘰的治療方法追尋咒術之驅動力(*impetus*)所描繪出之想像力的軌跡。

首先，山田慶兒分梳咒術療法的定義，及其主要使用於精神有關的疾病、沒法治療的疾病、偶發性疾病幾個範疇的原因。緊接著分析治療嬰兒瘰咒術所取用的物品：例如，為何取房頂邊緣的草？為何以柴燒之？「湮汲」的象徵意義、祝文的結構等。而更富想像力的是，山田慶兒將小兒瘰與姑獲鳥傳說繫聯起來。既然此病是被空中所飛疫鬼奪去魂所引起的，那麼，回過頭解釋上述咒術療法中所隱含之意義便水到渠成了。在本文中，神話傳說之鳥穿梭在宇宙論的場域，咒術

⁴ 川原秀城，〈日本學者如何研究中國科學史〉(下)，頁307。

行為也通過患者(小兒)將其意義展示出來。山田慶兒編織了窮極瑰奇的咒術、醫學與傳說的圖畫，令人目接不暇。

再者，爲了分析《內經》的結構及其成書過程，山田慶兒也利用馬王堆醫書與另一《內經》較古的傳本《太素》進行對比，嘗試釐清中國早期醫學發展的可能的脈絡。

以下是他的工作假設：(1)、從戰國到西漢，中國醫學中存在著三個大的學派，即黃帝學派、扁鵲學派、白氏學派(不同學派的著作見《漢書·藝文志》所載)。所謂《黃帝內經》應該是匯集了黃帝學派之醫師論文而成的著作。其中收錄不同時期，由不同著者寫成的文本。(2)、根據《內經》的問答形式及其所呈現的內容，可見該學派內部存在著分支學派：

《內經》中對話體的比較

對話者	回答者
雷公	黃帝
黃帝	少師
黃帝	伯高
黃帝	少俞
黃帝	岐伯

《東亞哲科》，頁 313

山田慶兒將每個分派稱之爲黃帝派、少師派、伯高派、少俞派、岐伯派。從他們的作品來看，黃帝派、少師派的文獻成立在先，其他三派則在後。(3)、馬王堆醫二種經脈書、《脈法》、《陰陽脈死候》

等是後來《內經》所收三篇論文(《太素》的〈經脈〉、〈九針所主〉、〈氣絕〉等)的直接祖本。這大概是《內經》最古層的論文群，而且山田慶兒以為這些論文恐怕是屬於黃帝派。

在《東亞哲科》亦收有專篇對「少師派」與「伯高派」的分析。根據山田慶兒的推測，西漢末年的《黃帝內經》僅是黃帝派與少師派作品的簡編，而以「計量解剖學」為主的伯高派則活躍於新朝。而由初期二派向後期三派的轉換，也是從陰陽說到五行說的轉換過程。所謂的岐伯派作品即是以五行說為其理論的主調。

關於山田慶兒的《內經》研究，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廖育群先生在給筆者的信中指出：「迄至今日，大陸的醫學研究及中醫教育中均存在著一種甚為強烈的不正傾向，即過分著重《素問》、《靈樞》的經典地位，以為那時醫學理論已經形成了一統、一致的認識，故對於不同章節中不一致的看法，亦要給與牽強附會的解釋。我曾經歷了這樣的教育與考試，甚覺痛苦與難於理解。故以為抓住不同對話者間理論、內容的差別來說明當時並未形成統一的理論體系，多少是找到了一點証據」⁵。借用山田慶兒自己的比喻，他的學說及發現可謂在漆黑的房間牆壁上突然打開了一扇可以射入光明的小窗(《東亞哲科》，頁258)！當然，山田慶兒的《內經》研究也引起若干不同的意見⁶。

除了《內經》研究之外，山田慶兒也探求中國醫學形成的戰國至秦漢時期，並闡釋中醫學的獨特性。例如，(1)、針灸學的起源；(2)、與這種針灸療法相結合基礎上，醫學理論的形成；(3)、藥物療法的發展(即由《神農本草經》到《傷寒雜病論》的發展)。山田慶兒提煉了許多極饒

⁵ 1995年9月12日廖育群先生給筆者的信函。

⁶ 例如，石田秀實，《中國醫學思想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2)，頁117-123；Paul U. Unschuld, "Der Wind als Ursache des Krankseins", *T'oung Pao* vol.68(1982)。

啓發性的洞見。例如，灸療法向針療法過渡發展、早期的「脈」血脈、經脈並無嚴格的區別、脈的發現一開始就是脈而不是在穴位與穴位聯線而產生脈的概念、針療法的所謂九針「具有完整地繼承了砭石的形狀與功能的東西」等等。在時間上，戰國末期在灸療法所達到的技術及理論基礎上，引進砭石療法技術而形成了針療法。其次，以針療爲主的醫生集團在漢代形成了學派(參上述《內經》研究)，在前漢末到後漢初創建了中醫學體系。大約在後漢末，張仲景將藥物療法與診斷學結合起來，體系化了藥物學的基礎(《東亞哲科》，頁255-264)。從而揭開了「湯劑時代」，華佗的醫術便是活動在此時代的具體表徵(《東亞哲科》，頁333-334)。

以上便是全書十四篇的概要。私淑山田慶兒的我，經常沈溺在其曲折、複雜的構思之中。正如編譯本書的廖育群先生所說：「讀山田慶兒的文章，確是一件很累的事」，「最大的難處就在於要能真正理解他所欲表達的思想」(〈跋〉)。當然，我的介紹當有不可避免的疏誤。以下便簡單談山田慶兒的研究對台灣學界尤其是醫學史研究的啓示。

戰後台灣醫學史的研究，粗略的說，大致可以分爲三期：早期的研究者有嚴一萍⁷、于景讓⁸、那琦⁹、陳勝崑¹⁰、蔡仁堅¹¹等。其中，那琦積極推展本草學之研究，並大力介紹多紀元胤《醫籍考》(1831)，

⁷ 嚴先生的醫學史作品收入《嚴一萍先生全集甲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91)。作品有〈殷契微醫〉、〈中國醫學之起源考略〉、〈新舊醫學之合流〉三種。

⁸ 于景讓，〈中國本草學起源試測〉，《大陸雜誌》23：5(1961)。

⁹ 那琦，《本草學》(台北：南大書局，1974)。

¹⁰ 《陳勝崑醫師全集》(台北：橘井文化事業公司，1992)，共五冊。

¹¹ 蔡仁堅，《科學與古老的中國》(台北：時報文化公司，1979)。

岡西爲人《宋以前醫籍考》等書志學成果¹²。陳勝崑則是有意識以醫學史爲研究領域的第一人。在問題意識上，李約瑟《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譯本自民國六十年底陸續問世，影響鉅大。當時的醫學史不可避免的也隨著「李約瑟難題」思索答案¹³。此外，早期出版的幾部醫學通史：如杜聰明《中西醫學史略》(1959)、劉伯驥《中國醫學史》(1974)、陳勝崑《中國傳統醫學史》(1979)、鄭曼青、林品石《中華醫藥學史》(1982)、史仲序《中國醫學史》(1984)等，執筆者皆是習醫出身。歷史工作者尙難插足醫學史的研究與教學，似乎也不受鼓勵。此爲第一階段¹⁴。

第二階段以任育才、熊秉真的研究最具代表。前者致力中國中古醫療組織、醫學教育及醫家之研究。後者則開闢中國童年史及衛生健康史之研究，尤啓中外學界之先河。

而一九九二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疾病、醫療與文化」研究小組的成立則又進入了另一個新的里程¹⁵。有關該小組研究成果之詳細介紹，見《新史學》六卷一期，在此不贅。相較於前二期，該小組的研究特色有二：(1)、由個人、零星的研究到以群體合作的方式；(2)、在研究取向則是以社會史、文化史爲主。山田慶兒過去三十年思想史、社會史成果在此時引介進台灣學界，無疑的具有重大的意義。如何對其已有的理論有足夠而必要的了解，掌握其基本假設與前提；以及對研究對象累積足夠廣泛的史料，確實的掌握史料的獨特性與普遍性，看來是我們未來該努力之方向。

¹² 那琦、那貴忠，〈近代中國醫藥目錄學專著〉，《科學史通訊》1(1982)。

¹³ 郭文華，〈陳勝崑的醫學史在台灣〉，《醫望》8(1995)，頁35-36。

¹⁴ 劉廣定，〈台灣四十年來科技史研究發展簡況〉，收入《陳勝崑醫師紀念集》(台北：橋井文化公司，1992)，頁117-224。

¹⁵ 杜正勝，〈「疾病、醫療與文化小組」的緣起與意義〉，《性與命》2(1995)。

最後，就以華岡青洲(1760-1835)的故事做為本文的結束罷。

紀州醫師華岡青洲在世界上首次取得全身麻醉下施行乳癌剔除的手術成功。據說，做為「發明動機」的華佗，曾經深深地影響著華岡青洲(《東亞哲科》，頁322-329)。無論是其製成的麻醉藥命名為「麻沸散」，或者私撰的《青囊秘錄》書名的靈感也是得自《三國演義》中華佗所遺失的方書。這種被稱之為發明史上的刺激傳播(stimulus diffusion)的現象，是否也將發生在山田慶兒與台灣學界之間呢？我深切的期待著。

山田慶兒兼集西洋史學與中國古典之訓練，煥發為深沈精邃之大塊文章，非僅為中國科學史挖掘出思想史、社會史的活水泉源，亦垂為東亞哲學與科技文化互通對話持之有年之典範。

山田慶兒，一九三二年生，福岡市人。歷任同志社大學工學部助教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現為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一九九〇獲頒中國科學院名譽教授。

山田慶兒先生論著目錄(初編)

- 1961 〈創立期のロンドン王立協會〉，收入《科學革命》，森北出版。
- 1963 〈中世の自然觀〉，收入《中國中世科學技術史の研究》，角川書店。
- 1965 〈《物類相感志》の成立〉，收入《篠田統先生退官記念論文集》。
- 1967 〈宋の自然哲學〉，收入《宋元時代の科學技術史》，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 1967 《技術科學論》，譯著，法律文化社。
- 1968 《未來への問い》，筑摩書房。
- 1970 〈中國科學〉，收入廣重徹編《科學史のすすめ》，筑摩書房。
- 1970 〈耶穌會士の科學研究〉，收入《明清時代の科學技術史》，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 1970 《中國革命》，編，筑摩書房。
- 1973 《人間學への試み》，編，筑摩書房。
- 1974-1977
《東と西の學者と工匠》二冊，譯著，河出書房新社。
- 1975 〈梁武の蓋天說〉，《東方學報》48。
- 1975 《混沌の海へ——中國的思考の構造——》，筑摩書房。
- 1976 《星界の報告・他一編》，共譯，岩波書房。此書是山田先生由意大利文翻譯。

- 1978 〈授時曆への道——元朝治下の天文臺と天文學者——〉
，收入《中國の科學と科學者》。
- 1978 《中國の科學と科學者》，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 1978 《朱子の自然學》，岩波書店。
- 1979 〈黃帝內經の成立〉，《思想》627。
- 1979 〈古代中國における醫學の傳授について〉，《漢方研究》
94-95。
- 1979 〈日本の大學の理學部——その科學社會史的側面〉，收
入《近代科學再考》，朝日新聞社。
- 1979 “The Formation of Huang-ti Nei-ching,” *ACTA ASIATICA*
36。
- 1980 〈九宮八風說と少師派の立場〉，《東方學報》52。
- 1980 《授時曆の道——中國中世の科學と國家——》，みすず
書房。
- 1980 《技術の歴史11》，譯編，筑摩書房。
- 1982 《三浦梅園》，中央公論社。
- 1982 《科學と技術の近代》，朝日新聞社。
- 1983 〈古代の水時計〉，《自然》446、447。
- 1983 《科學史技術史事典》，共編，弘文堂。
- 1985 〈夜鳴く鳥〉，《思想》736。
- 1985 〈馬王堆漢墓出土醫書三則〉，收入《新發現中國科學史
資料の研究・論考篇》。
- 1985 〈鍼灸と湯液の起源〉，收入《新發現中國科學史資料の
研究・論考篇》。
- 1985 《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共譯，みすず書房。

- 1985 《新發現中國科學史資料の研究・譯注篇》，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 1985 《新發現中國科學史資料の研究・論考篇》，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 1988 〈扁鵲傳說〉，《東方學報》60。
- 1988 《黒い言葉の空間》，中央公論社。此書是三浦梅園《玄語》(1775)的現代語譯本。
- 1989 〈本草の起源〉，收入《中國古代科學史論》。
- 1989 《中國古代科學史論》，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 1990 〈傳統醫學の歴史と理論〉，收入《東洋醫學入門》，讀賣新聞社。
- 1990 《夜鳴く鳥——醫學・咒術・傳說》，岩波書店。
- 1991 〈伯高派の計量解剖學と人體計測の思想〉，收入《中國古代科學史論續篇》。
- 1991 《中國古代科學史論續篇》，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 1992 〈技術與人〉，收入吳之靜主編《天・地・人》，科學普及出版社。
- 1992 “Anatometrics in Ancient China,” *Chinese Science* 10。
- 1992 《中國科學史國際會議：1987 京都シンポジウム》報告書，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 1993 〈漢方的なるものをめぐって〉，《Bellmedico》9：1。
- 1993 〈中國醫學のはじまり〉，《Bellmedico》9：2。
- 1993 〈甲骨文にみる病と治療〉，《Bellmedico》9：3。
- 1993 〈紫金の光——中國鍊金術における科學と宗教——〉，收入《歴史のなかの宗教と科學》，岩波書店。
- 1993 〈歐洲・アジア間の科學・技術の移轉〉，《朝日新聞夕

刊》。

1996 《古代東亞哲學與科技文化》，遼寧教育出版社。